

王滋源

论语 新译评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王滋源

论语新译评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润生
封面设计：袁 耕

论语新译评述

Lunyu Xinyi Pi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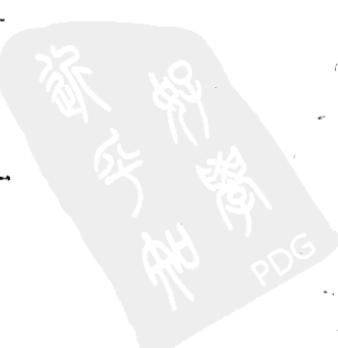
王滋源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2 10/16·插页 2·字数 300,000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8,017

统一书号：10093·799 定价：3.80 元

ISBN 7-207-00117-7/J·22



前　　言

(一)

孔子，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特殊情况：一，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民族心理特点的形成影响最大。二，关于他的评价争论最多，分歧也最尖锐，誉之者将他比天，比太阳，比月亮，称之为空前绝后的天纵之圣，或至圣先师，毁之者管他叫干尽了坏事的复辟狂。三，他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学说思想极其庞杂而又包含着矛盾。特别是历史上经过两次大改造和两次大冲击，以及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利用和吹捧，使本来就复杂的问题更趋复杂。西汉的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对孔子学说进行了第一次大改造。宋代的程颢、程颐和朱熹用他们羼进了佛学的理学对孔子学说进行了第二次大改造。第一次大冲击是1919年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的五四运动。当时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响亮口号，无疑是绝对正确的。但孔家店的老板并非孔子，而是把孔子神化、偶像化，借以禁锢人们思想、维护吃人礼教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反动派。“孔家店”兜销的货色，并不真正是孔子学说中的积极进步的合理部份，而大都是经过御用学者涂抹改装、加油添醋的一些冒充孔子正统和僵死教条之类的东

西。所以在客观上把孔子和“孔家店”完全等同起来，就不够实事求是了。“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大冲击，把水搅得更浑。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卷2第499页）时间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总结孔子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上述情况当系主要原因。

三中全会以后，孔子研究日趋活跃，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正如中华孔子研究所所长张岱年同志指出的：尊孔的时代过去了，批孔的时代也过去了，现在开始了研究孔子的时代。对孔子的再研究和再评价引起学术界广泛兴趣，不少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然而对孔子评价的分歧还比较大，例如蔡尚思同志的《孔子思想体系》和匡亚明同志的《孔子评传》便代表着偏于否定和偏于肯定这两种不同意见。

笔者认为，要正确地评价孔子和孔子思想，拨开重重迷雾，还孔子以本来面目，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大量占有材料（古今中外，肯定的或否定的均不可忽略）的基础上，联系孔子的时代背景，对孔子和孔子思想进行历史主义、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要弄清：一，孔子和“孔家店”的区别和联系；二，孔子和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有的人只见联系不见区别，有的人只见区别不见联系，自然都不能正确评价孔子。更重要的是要充分把握孔子这一历史人物本身的特点，为他正名，也就是给他选制适当的帽子。现在通行的帽子有三顶，即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个人认为，伟大的教育家和伟大的思想家这两顶帽子基本上合适，至于伟大的政治家这顶帽子就不大合适了。因为首先他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落后的；其次，他的政治实践是失败的。除了这些帽子之外，是否还可以送他几顶帽子戴戴呢？我

认为是可以的：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现了人的人道主义者；二，学而不厌，不耻下问，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的道德家和理想主义者；三，学习、把握了古代大量遗文，审定、编纂了诸如《诗》、《书》、《易》、《礼》、《春秋》等典籍，并用以教育学生的文化巨人。此外，如反对兼并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对周礼有所损益的改良主义者等帽子也基本适用。

以上便是拙著《论语新译评述》中对孔子评价的概括。

(二)

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思想家之一，当时人类文化的发展还极为幼稚，极不成熟。他是最早出来总结和回答生活中提出的若干问题的人。因而有第一个发言者的优越条件（不怕别人抢先）。从他本人主客观条件看，他年轻时贫贱，给贵族放养过牛羊，当过会计出纳，还当过吹鼓手；他多才多艺，会射箭、赶车、唱歌，精通琴、瑟、磬等诸般乐器。这都说明他在实际生活中受过磨炼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热爱学习，十五岁便立志向学，勤奋努力，不耻下问，善于学习不同人的特长。他生活在保存周礼和古代典籍较完备的鲁国，因而得以掌握大量的古代遗文。中年以后周游列国，又跑了不少地方，考察各地风俗民情，结交各国上层人士，增长了见闻。他本人比较聪明，思想方法又对头，“不主观臆测，不绝对武断，不墨守成规，不自以为是。”因而他总结、回答生活中的问题，不少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乐道人之善”，“德不孤，必有邻”，“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还有什么“食不语，寝不言”，没有弄懂药性，不乱吃药等等。不但过去正确，现在正确，将来恐怕也正确。这些当属于《论语》中的精华。

《论语》中也有不少糟粕，应当批判扬弃。如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春秋末期，孔子却牢牢抱住西周奴隶制的周礼不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都表明了他落后、保守的政治立场，应当批判。还有他在关于孝（悌）的说教中，宣扬了封建宗法思想，如强调“三年之丧”，宣扬“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母在，不远游”，甚至还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置亲亲关系于法律之上等等，对后代有严重消极影响，是吃人礼教的组成部份，在今天尚有流毒，应当批判扬弃。此外，他轻视劳动，轻视妇女，不重视对自然研究，这些也应加以批判或指出其不足。

孔子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修养，他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总德之名，下面还有忠、恕、恭、宽、信、敏、惠、刚、直等德目。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教育思想，政治思想，道和中庸，均占有重要地位。文艺思想也是一个组成部份。以道人之善为乐的孔子对当代人物（包括自己的学生）和历史人物约六十人进行过评论，大多是表扬，也有批评，从中反映出孔子的是非观点。以上条目有精华，也有糟粕，评述时一一作了分析批判，或交代其背景。《论语》中有不少孔子的话是回答学生或有关人士提问的，如问仁，问孝，问政等，孔子都根据提问者不同实际，对同样的问题提出不同的回答，针对性很强。平日谈话也大都有放矢，有所谓而发。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便是针对卫灵公讲的，评述时都尽量找出根据，予以交代。

孔子思想还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如关于“天命”、“命”的认

识，有时似乎是指客观自然规律，有时似乎是指人格神上帝的命令。联系《易经》、《春秋》有关内容考察，个人认为，孔子早期是有神论者，晚期是无神论者。又如关于承不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也有矛盾，一方面，孔子正确地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同时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或别的人是“生而知之者”，似乎不承认有天才。但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还说什么“生而知之者上也”，似乎又承认有天才。关于生活，有时是低标准，“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有时又是高标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三)

《论语新译评述》，除《论语》原文外，包括注释、译文和评述三个部份，而以译文和评述为主。翻译时侧重意译，解放思想，古为今用，力求在保持孔子原意的同时，做到通俗易懂，再辅之以简要的注释，结合评述研读，使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皆能了然于胸，对这部典籍有一个批判性的认识，以资借鉴，让《论语》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发挥一定作用。

重点中的重点是评述。评述中坚持实事求是，从原文的实际出发，或评述结合，或评或述，评偏于分析评论，述偏于背景或历史知识介绍，可长可短，或详或略，同时注意前后照应，略于此者详于彼，略于彼者详于此。不管是评论还是介绍，都出之于严肃的科学态度，既不美化古人，也不苛求古人，当肯定者肯定之，当否定者坚决批判扬弃之。科学性、独创性和通俗性，是本书追求的目标，条件许可，也适当注意知识性和趣味性。只是限于水平，不仅距此目标尚远，恐还不免错误百出，希望广大读者和方家指正。

(四)

《论语》成书之后，有关它的注释和研究著作不下三千多种。这本小书正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接触的书十分有限，何宴的《论语集释》、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四书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康有为的《论语注》是主要参考书。特别是近人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杨树达先生的《论语疏证》、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给了作者不少帮助，在此特别指出。此外，还参阅了不少中国哲学史、有关《论语》的专著和论文，就不一一指明了。

1987年2月7日

目 次

学而篇第一	1
为政篇第二	18
八佾篇第三	38
里仁篇第四	62
公冶长篇第五	78
雍也篇第六	101
述而篇第七	124
泰伯篇第八	151
子罕篇第九	167
乡党篇第十	189
先进篇第十一	204
颜渊篇第十二	225
子路篇第十三	245
宪问篇第十四	270
卫灵公篇第十五	302
季氏篇第十六	327
阳货篇第十七	340
微子篇第十八	362
子张篇第十九	373
尧曰篇第二十	390

论语新译评述

学而篇第一

(共十六章)

1·1 子^①曰：“学^②而时习^③之，不亦说^④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⑤不知，而不愠^⑥，不亦君子^⑦乎？”

〔注释〕①子——《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而言，“子曰”即孔子说。②学——孔子强调温故而知新，所以这里的“学”，当指“学习过的东西”。③时习——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复习。④说——音读和意义跟“悦”(yuè)字相同，高兴，愉快。⑤人——这里的人，指当时的诸侯或卿大夫。⑥愠——(yùn)，音运。懊丧，怨恨。⑦君子——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有道德的人；二、指诸侯或卿大夫等在上位的人；三、指在上位又有德行的人以及其它。这里指有德者。

〔译文〕孔子说：“对学习过的东西按时进行复习，难道不感到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难道不感到快乐吗？（有真才实学，）※并不为人君所知，但自己并不感到懊丧。这样的人，难道算不得一个有道德的人吗？”

※《论语》文字较简略，间有阙文，为帮助读者理解，译文中加进一些话是必要的，但为了和正文有别，特加上括号，下同。

〔评述〕这是《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内容十分重要。孔子结合自己实际谈成才问题。短短三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基本方面。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的一生是自我完善（即成才）的一生。他曾叙述过自己从十五岁到七十岁思想学业不断进步的历程，即成才的过程。发愤忘食地勤奋学习，不断地温故知新；朋友间互相切磋，“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2·24），正是他自我完善的主要手段。在当时，他之所以在学习上、教育上、文献整理上取得突出的成就，普遍受到人们，特别是弟子们的尊敬，不是偶然的。

孔子并非为自我完善而自我完善，成才的目的是为了“行道”，恢复周礼，或如他的弟子子夏所说“学而优则仕”（19·13），也就是当官。所以第三句话“人不知”的“人”自然指的是当权的诸侯们。孔子的一生又是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积极求人知，求人用，而又不为人所知所用的一生。晚年，他自叹道：“莫我知也夫！”还说：“知我者，其天乎！”可贵的是，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消极过，具有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不怨天，不尤人”（均见14·35），真正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他在言行一致上为后代树立了榜样。

如何对待孔子的遗言，自然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试以这段话为例，头两句，“学而时习”，“有朋自远方来”，是属于精华的范畴，是可以继承、借鉴的。但孔子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具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即使是精华也不能全盘照搬，而应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从形式上看，学而时习，勤奋好学，温故知新，自然是可供借鉴。但要看到：我们今天学习的目的、内容、方法，和孔子的便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不难理解的。

笼统地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话讲得很好，它培养了，影响了我们民族的好客精神。在今天，国际交往场合，

还常常被引用。但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孔子是站在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士”的立场上讲这番话的，具有鲜明的阶级局限性。

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愠”则反映了孔子“忠君尊王”的立场，结合着“犯而不校”、“温柔敦厚”的说教，对后代知识分子产生过长远而深刻的消极影响，即逆来顺受，不敢造反，对巩固封建统治起了一定作用，应当批判。

1·2 有子^①曰：“其为人也孝弟^②，而好犯^③上者，鲜^④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⑤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⑥！”

〔注释〕①有子——孔子的高材生，姓有，名若。《论语》记载孔子学生的言行一般称名道姓，唯独曾参和有若例外，也称子。所以有人怀疑《论语》是由他二人的弟子所编纂整理，此说可以存疑。有若称子，也可能在孔子逝世以后，他与曾参一度为孔子其他弟子们所尊重的缘故。②孝弟——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孝，是所谓“百行之先”，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神圣义务，可释为孝顺。弟（tì，读悌），是弟弟对兄长的正确态度，即尊敬。③犯——抵触、违反、冒犯。④鲜——（xiǎn），音显，少。

⑤道——《论语》中，道字出现很多，含义不同，此处系指“仁道”。
⑥与——即欤字，表示疑问的助词。《论语》中的欤字皆作与。

〔译文〕有子说：“就他的为人来看，在家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在外却冒犯上司，这样的人是罕见的；不爱冒犯上司，却偏爱造反作乱，这种人也是根本不会有的。所以有道德的人，一定要抓住这个根本。根本建立了便会产生仁道，‘孝’和‘弟’这两条啊，大概便是仁道的根本吧！”

〔评述〕有子这段话，首先提出用提倡孝弟来防止犯上作乱，公开宣扬了“造反无理”的主张。这无论对巩固奴隶主统治还是巩固封建主统治来说均极有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不是偶然的。这无疑是应当扬弃的封建性糟粕。

《论语》书中提到“仁”的地方极多，“孝弟为仁之本”是书中出现的第一个“仁”字。有子这个命题体现了儒家学说的一条重要理论。杨树达先生解释说：“爱亲，孝也；敬兄，弟也。儒家学说，欲使人本其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而扩大之，由家庭以及其国家，以及全人类，进而至于大同，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然博爱人类进至大同之境，乃以爱亲敬兄之良知良能为其始基，故曰孝弟为仁之本。”（《论语疏证》）杨先生对有子这句话的解释基本符合有子的原意。从这解释可以看出，儒家这一学说既包含着重视家庭教育，并把它与社会影响联系起来的正确主张，又含有唯心的空想的成份。在阶级社会，离开了阶级性而谈“良知良能”便谈不通，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而谈进入大同更是乌托邦的幻想。

1·3 子曰：“巧言令色^①，鲜矣仁^②！”

〔注释〕①巧言令色——据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包咸注：“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悦）之。”“好”和“善”都是装出来的，其目的则是为了讨好别人。故以花言巧语译巧言，以伪装的面貌译令色。

②仁——指仁者。

〔译文〕孔子说：“逢人花言巧语，装出一副伪善的面貌，这样的人，有几个是仁者呢！”

〔评述〕孔子这句话，与《子路篇》第二十七章所讲的“刚、毅、

木、讷近仁”以及《论语》中不少谈“直”之处对照着看，便不难发现，孔子恶虚伪，尚质朴，强调人应有真性情。据冯友兰先生解释：“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中国哲学史》上册 97 页）“巧言令色”、自我矫饰以求媚悦于人，非性情的真的流露，故“鲜矣仁”；相反，“刚毅木讷”之人，言若不能出口，但质朴有真性情，故得“近仁”。

1·4 曾子^①曰：“吾日三省^②吾身——为人^③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④乎？传^⑤不习^⑥乎？”

〔注释〕①曾子——孔子的高材生，名参，字子舆，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东南）人。②三省——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次数而言，指多次；一是以三条来进行自我反省。朱熹即持后一看法：“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看法较为合理。因为昨日之事已反省过，今日之晨，一切刚刚开始，又从何反省起？所谓反省必须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学习之后，才有可以反省的内容。《大戴礼·曾子立事篇》说：“日旦就业，夕而反省，是以歿其身亦可谓守业矣。”可见曾子明确地指出，白天（日旦）就业，晚上（夕）反省。若一日三省，有何必要，岂不流于繁琐和形式主义。③“为人谋”中之人——可泛指一般人，也可指君，今译按前义。

④信——信用。⑤传——老师讲授的功课。⑥习——温习、复习。

〔译文〕曾子说：“我每天用这三条来进行自我反省——替人出谋划策是否竭尽忠诚了呢？和朋友交往是否遵守信用了呢？老师传授的功课是否复习了呢？”

〔评述〕曾子这段话提出了个人自我反省的三条标准，即为人

谋要忠，与朋友交要信，对所传之功课要复习。忠、信和习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忠信为传习之本”（朱熹：《四书集注》）。或如康有为所说：“忠信以立德，专学以成材。”（《论语注》）

看来，曾子是很注意以自我反省的方式来进进行自我修养的。如有的注疏家所说，“其学以修身守约为宗旨。”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引用过“吾日三省吾身”这句话。指出“这是说自我反省的问题”，并肯定“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少奇同志接着还指出：“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刘少奇选集》上卷 109 页）

从曾子这段话的原意看，不管是为人谋也好，与朋友交也好，还是接受老师传授的功课也好，还都是当日的实践。所谓反省是反省自己的社会实践。当然，这实践的内容有时代的局限。到了后代，有的学者认为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便歪曲了曾子的原意，而把这种修养完全变成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实践的东西。

1·5 子曰：“道^①千乘^②之国，敬事^③而信，节用而爱人^④，使民以时。”

〔注释〕①道——引导之意。此处译为治理。 ②千乘——千辆兵车。古代按土地、人民出兵车。可以出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据马融说，这国家的面积，应为“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包咸则认为：“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译文从马说。 ③敬事——“事”，指国家大事。就当时国家而言，主要便是祭祀和军事两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当然，还有选任官

史、教育等项。所谓敬事，指对待国家大事要特别慎重。④爱人——“人”，有两意，一是泛指一般人，一是指士大夫以上阶层的人。此处用的是前义，与民意义相同。人与民对称，只是为了行文的缘故。

[译文]孔子说：“治理幅员三百里大小的国家，处理对内对外的大事，要特别慎重，以取信于民，开支要节省以爱护人民，役使他们要注意不妨农务。”

[评述]这段话反映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他提出了五条：敬事、取信于民、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孔子是主张推行仁政的。孔子心目中的仁者，便是“爱人”。所以在谈政治主张时，便提出了“爱人”这一条。爱人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取得老百姓的拥护。为此，孔子还主张取信于民和使民以时。怎样取信于民呢？关键在于敬事。国君在对待国家大事上能敬慎从事，老百姓自然才能信服；在大事上如举止失措，漫不经心，百姓就会离心离德了。使民以时也很重要，其目的是为了增加生产，可以从百姓身上多取一些，再加以节用，节省开支，国家自然就富强了。

鲁迅先生在他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过：“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全集》第六卷254页）的确，孔子这段话便是为统治者设想的治国的方法，说它出色，也不为过。鲁迅先生深刻地指出了孔子政治思想的阶级属性，即他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统治者设想的；并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设想。不过，从客观效果看，人民生活在“仁政”之下，较之生活在暴政之下，毕竟要好一些。从这一意义上说，孔子这话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对它正确的态度，还是要“一